

保思想、可持续发展战略、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相提并论，治理生态环境的成就也并不全如人意，但毕竟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治理西部生态环境的新思路、新征程，具有重要意义。尤其是他在西北植树造林、改造环境的做法，留下了西部开发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植树造林，即以现代眼光而言，也是治理西部生态环境不可替代的方法之一。左宗棠给后人留下了一道“左公柳”的生态线和一座“柳公种柳”精神的丰碑。从唐代进军西北时诗人口中凄凉的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吟唱，到近代左宗棠挥师西进，高奏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的开发凯歌，谁能说左宗棠创造的不是一个新的境界，开启的不是一个新的征程呢？

第五节 左公柳的生态与文化诠释

“左公柳”其实并不是确指柳树的某一品种，左宗棠当时号召军民栽种的树木有旱柳、榆钱、小叶杨、新疆杨等很多种，其中因旱柳一种栽植最多，故得此称。在中国的古树名木中，像“左公柳”这样以人物命名的树种并不多见，这是老百姓对绿化山川、造福一方的地方官的一种褒扬、赞许和肯定。可以想见，在戈壁大漠、黄土高坡上出现夹道绵延数千里的绿色，是怎样一种景观。如今，左公柳越来越少，已成为一种历史的陈迹，一种逝去的风景，但是，百多年来，人们念念不忘左公柳、赞美左公柳。有关左公柳的记述、追忆、传说和诗话的不断流传与衍生，已成为西北特有的一道文化景观。

一、近人关于左公柳的记述

除了前述有关左公柳的资料，我们还集中披阅了清末民初时许多关于西北的游记、著述以及地方志，查找其中对左公柳的片段描述和零星记载。无独有偶，陈乐道先生在《档案》杂志上发表《“左公柳”：远去的风景》一文，也作了同样的考证。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到，虽然时人评说左

公柳的角度不尽相同，但对左公柳都含有一种相当深厚的眷念与赞美之情，凭吊左公柳成了一种到西北必做的虔诚的祭祀，记述左公柳成了他们感怀前贤、体念时艰、鼓吹开发西北的借口。

最早记述左公柳的当是冯焌光，他在1877年自上海前往新疆，在进入甘肃泾州地界时写道：“自此以西，夹道植柳，绿荫蔽天。”^①到会宁附近，又记道：“过此则途径旷然，夹道杨柳荫庇行路。”^②1891年，陶保廉随父陶模（调任新疆巡抚）进京述职，返回新疆时，将沿途见闻写成书，其中对左公柳也有片言只字的记载：“出隆德西门折北行，两旁皆山……八里铺（即得胜铺），迤西道树成行。”^③蒙古族人阔普通武1903年自西宁办事大臣任上罢官，在返回京师途中写道：10月29日，“晚宿会宁县……自入县西境，官道两旁，杨柳稠密，十年树木，令人忆左文襄之遗爱”^④。1905年，裴景福在其《河海昆仑录》中，对植树造林、保护植被予以关注。特别是看到左公柳遭伐的情景，作者为之感慨不已：“仆人购薪引火，有枯枝干脆易燃，询之，乃盗伐官柳，闻而伤之。泾州以西达关外，夹道杨柳连荫三千里，左文襄公镇陇时所植也。”^⑤1911年，袁大化赴任新疆巡抚，当行至肃州时写道：“回望陇树秦云，苍茫无际，驿路一线……长杨夹道，垂柳拂堤，春光入玉门矣。”^⑥

辛亥革命之后的1923年，美国人兰登·华尔纳率福格艺术考察队前往敦煌考察。是年秋，越过陕西省界进入甘肃，看到这里种的左公柳“已经长成了，成排成行，夹道矗立”。华尔纳认为，“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，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，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，同时，也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为数不多的旅行者们带来恩惠”。在连续一个月的旅途当中，“连绵不断的柳树和参天耸立的白杨齐齐整整地排列在道路两旁，这些树木穿过两山之间伸向远方的平地，翻山越谷，蜿蜒行进，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奇景”。这些都

① 冯焌光：《西行日记》，第118页。

② 冯焌光：《西行日记》，第120页。

③ 陶保廉：《辛卯侍行记》，第204页。

④ 阔普通武：《湟中行记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72页。

⑤ 裴景福：《河海昆仑录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20页。

⑥ 袁大化：《抚新纪程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95页。

被记载在其所著考察记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》。

1932年12月，林鹏侠女士奉母之命，从上海出发，历时半载，对西北各地进行考察，在从平凉城至六盘山时写道：“途中荒凉满目，惟左公柳时或一现，但已零落晨星矣……夹道浓绿，当时有万里康庄之目。惜年久无人管理，又值连年天人交祸，民不聊生，树皮根芽，均被灾民剥食垂尽。呜呼惨矣！左公遗迹，亦将被湮没而空留嘉话之传流矣！自潼关至此，崇山峻岭，平原广川，一例牛山濯濯。气候干燥，雨量不调，盖荒旱频仍之因。不知以往司民牧者，何以不注意也。”^①

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，上海《申报》记者陈赓雅，前往边疆视察，对左公柳的保存及遭毁情景，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。在行至天祝乌鞘岭时写道：“左宗棠西征时，沿途所植榆柳，多已皮剥枯倒，至此尤了无一株，惟青草丰肥，差堪牧畜耳。”^②至静宁、隆德间，则“沿途杨柳，不绝于目——系左宗棠督陕甘时，令防营所植，俗称‘左公柳’，颇有纪念意味。树粗一抱多，高二三丈，每株相间三四步，夹道成行。夏日枝叶交荫，征客受益不浅也！”^③

陈赓雅还专门就“大佛寺与左公柳”详加记载：“陕甘驿道，两旁所植‘左公柳’，当其繁荣时期，东自潼关，西至嘉峪关，长凡三四千里，皆高枝蔽日，浓荫覆道。征客途行，仰荷荫庇，无不盛称左氏遗泽。盖提倡种树已不易，种树成林更不易，成林而有历史价值，国防交通意义，尤属难能可贵。惜柳线所经各县，官厅不知保护，坐令莠民任意摧残，或借医病为名，剥皮寻虫；或称风雨所折，窃伐作薪，以致断断续续，不复繁盛如昔。尤其昨今两日所过驿道，往往长行数十里，尚无一株，荒凉满目，诚有负前人多矣！”自长武至乾县途中触景生情，有此感唱。接着笔锋一转，指出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之重要与紧迫：“西北面积虽广，但多荒山旷野，一任荒废，利弃于地，既感生产缺乏，复酿水、旱各灾。倘能以之培植森林，则可立致富源。且西北气候，系大陆性而兼沙漠性，朔风一起，尘沙蔽天，沙漠有南迁之势，诚非无稽

① 林鹏侠：《西北行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4页。

② 陈赓雅：《西北视察记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59页。

③ 陈赓雅：《西北视察记》，第281页。

之谈。若不积极造林，前途殊堪危险！……至于植林间接效用，调和气候，涵养水源，防弭旱涝，御蔽风沙，增进风景，裨益卫生，更不胜数。法相阿尔脱尔勃尝谓：‘亡法国者，非敌国外患，乃在山林之荒废。’此言无异为我西北下针砭。今后广植新树，保护旧林，迅宜双管齐下，不容再缓矣。”^①其议论颇有见地。

1935年印行的《重修隆德县志》，对左公柳作了这样的记载：“由隆德城东行经十里铺……入静宁界，合计东西全长九十里，此系官道，坦途两边齐栽白杨绿柳，春夏青青，左公遗爱也。车鳞马啸，络绎不绝。”虽仅寥寥数语，却颇耐玩味。

同年，赴西北游历考察的张扬明，在其所著《到西北来》中写道，清水至天水途中，“路旁有很多古柳，名左公柳，为左文襄公开发新疆时所植。闻说这种柳树，一直到天水、定西、皋兰一带，绵亘数千里，共约六十万株；因左公当时来到此地，看见地形复杂，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，植柳作为标识。”

邵元冲在其1936年出版的《西北随轶记》中，这样写道：“自窑店以西，已入甘境，驿树夹道，迎风而舞，盖悉为左宗棠所植者也，号曰左公柳。按左相当年所植柳树，实起陕之潼关以达新疆哈密，然自潼关至西安道中，零落殆尽，西安至窑店，则已斩伐无余株矣，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。”^②书中并有泾川左公柳的插图。

1936年出版的《西北揽胜》对左公柳特作介绍：“自陕西而经窑店即入甘肃境，自此西行，驿路两旁，时见柳树成行，大可拱围，高枝参天，均系左宗棠督陕甘时令防营所植者，故名左公柳。按，当时所植柳，自陕之潼关直抵玉门关绵亘达三千余里。嗣后历经兵燹旱涝，砍伐甚多。今则除泾川、平凉以及永登等县内，偶见成行外，余或三三两两，以示驿路之所在，或则连根拔除已一无所见矣。”且有插图，显然将左公柳列为西北胜景之一，向世人宣传。

著名记者范长江自1935年7月起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旅行的通讯合集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出版，其中记载了左公柳。当1935年冬，行至

① 陈赓雅：《西北视察记》，第289—290页。

② 邵元冲：《西北随轶记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1页。

永登途中，看到“庄浪河东西两岸的冲积平原上，杨柳相望，水渠交通……道旁尚间有左宗棠征新疆时所植柳树，古老苍劲，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，不胜其企慕之思”。在后来出版的范长江的另一通讯集《塞上行》里，且有对平凉途中所见左公柳的描述：“下华家岭，至界石铺，又合昔日陕甘大车大道，左宗棠当年经营西北所植柳树，还有不少留于大路两旁。”“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，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，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，以当时交通工具之简单，他的道路路面比现在国道路面为广，此公胸襟之远阔，实不同于当时凡俗之武夫。惟时至今日，左公柳已丧亡十九，长安至新疆之大道，仅若干处略存左柳，以引对前人辛苦经边之回想，其实用的价值，实已渺无可称述。”

1939年印行的《重修古浪县志》里对左公柳特予说明：“所谓人造林者为左公林、学校林。左公林由县南龙沟堡迤县北小桥堡，沿道节节有之，但皆稀疏，已枯死无多。”

丁履进在1940年写的《西兰之间》“忆左宗棠”一章里写道：“左氏由潼关至迪化，运用兵工，开辟大道，夹道植树，保护路面，迄今陕甘公路两侧，老树峥嵘，所谓左公柳者是也。惜后人不加爱护，所伐殆尽，于今所见，依稀数株而已。”不无怅触。

最后，张其昀、任美镠在1942年出版的《甘肃人文地理志》里，对左公柳也作了记载，指出植树之重要作用：“将来甘肃中部造林，似宜以杨、柳、榆、侧柏等较为适宜，山坡土壤冲蚀最烈，尤宜首先植树，保护梯田之肥土。昔光绪初左宗棠总督甘、陕，尝于甘陕大道两旁栽植杨柳，东起西安，西迄酒泉，郁郁千里，官厅保护迄今已五十余年，有大至数围者，人定胜天，此其明证，惜自民国十五年以还，兵乱纷起，左公柳破坏甚多，惟就其所遗者观之，当代苦心犹昭然可见也。”

透过前人留下的真切记载和生动描绘，透过时光老人投下的深长一瞥，我们仿佛看到了左公柳曾经拥有过的辉煌，领略到其迷人的风韵，深感保护植被、保护古树名木，尤其是保护生态环境之亟迫。

二、晚清民国时期甘肃地方政府对左公柳的保护

如前所述，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加上新疆所种的柳树，约有一两百万

株。

1935年，甘肃省政府对当时的左公柳进行统计时，平凉境内尚有7978株，隆德5203株，静宁1386株，固原4351株，山丹1220株，永昌1311株，临泽235株，古浪1015株。这些左公柳，“均经编列号数，各悬木牌，高钉树身，以为标志”^①。

1998年8月出版的《甘肃森林》记载本省境内尚有左公柳202株，其中平凉柳湖公园内187株，兰州滨河东路13株，酒泉泉湖公园内仅有2株。

将上面的这三组统计数字略作比较，就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。左公柳急速锐减，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，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为的砍伐。尽管当时的政府制定了相关办法加以保护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效果，但最终却未能扼制住左公柳频遭砍伐的势头，那昔日“密如木城，行列整齐”的景观，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，引人深思。

早在清代末期，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员，就曾在古道两旁张榜告谕：“昆仑之阴，积雪皑皑，杯洒阳关，马嘶人泣，谁引春风？千里一碧，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。”^②这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保护左公柳的官方文字。但可惜的是，砍伐左公柳的情况此后接连发生，从未停止过。1909年，新疆巡抚袁大化路过永登，见到境内大量左公柳被人砍伐，“有未伐者，枝亦被人砍”。

1920年，据《甘宁青史略》记载，甘肃“地地震，东西路桥遂多毁坏，县知事伐官树以补之，以公办公，尚无不可，惟此端一开，绅民效尤，已伐去十分之三”。省政府对此耳有所闻，遂通令泾川、固原、平凉、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定西、通渭、榆中、皋兰、永登、古浪、武威、永昌、玉门、山丹、民乐、张掖、临泽、高台、酒泉、安西等县，要求“将官树编列号数，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”。

1927年以后，为支应当地驻军、兵站的燃料需要，各县旧驿道两旁大量左公柳被“旦旦而伐之，以至于今所存者仅十分之三”^③。

① 王艾邦、陈乐道：《“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”——民国时保护“左公柳”史档解读》，《档案》2003年第4期。

② 裴景福：《河海昆仑录》，第120页。

③ 慕寿祺：《甘宁青史略》卷31，第9页。

1928年，刘郁芬派兵进驻临夏，在西固设立兵站，向当地群众征派大量烧柴，西固川的树木被砍伐一空，其中也有左公柳惨遭厄运。与此同时，榆中、皋兰境内的左公柳也被当地驻军大量砍伐。

据傅增湘《秦游日记》记载，1933年，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，亲见左公柳“今则旱槁之后，继以兵残，髡枝弱线，十里不逢一株”，不禁发出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的浩叹。

1934年春，张恨水漫游西北，一入甘肃，只见沿路左公柳破伐殆尽，所余无多，均剥尽树皮，用以充饥了。这应是民国十八年甘肃大旱，引起大饥荒的结果。张在感伤之余，写了一首竹枝词：“大恩要谢左宗棠，种下垂杨绿两行。剥下树皮和草煮，又充饭菜又充汤。”^①

针对左公柳屡遭砍伐等情况，1932年11月26日，甘肃省建设厅呈准省政府颁布《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》，其内容如下：

第一条，甘肃旧驿道两旁所有之左公柳，均依本办法保护之。

第二条，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，现责成各区长点数，具结负责保护。区长更调时，应特列专册移交，并由新任区长加结备案；县长更调时，亦应专案交收，呈报建设厅备案。

第三条，各县长、区长无论因何理由，不得砍伐或损坏，如有上项情事，一经查觉，县长记过，区长撤惩。

第四条，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，除依法罚办外，并责成补栽，每损坏一株，应补栽行道树百株，并责令保护成活。

第五条，本办法由建设厅呈准省政府公布施行。

这一《保护办法》虽显粗糙，但它用行政立法的形式对左公柳加以保护，足见其对保护左公柳的重视。

1935年甘肃省再次颁发了《保护左公柳办法》，内容如下：

一、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，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，依

^① 张晓水：《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2年第1期。

次逐株挂牌、编号（单号在北，双号在南），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。

二、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，应分段责成附近乡、保、甲长负责保护，并由县随时派员视查。

三、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，仍须保留，不得伐用其木材。

四、已被砍伐者，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之处，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，并责令附近保、甲长监督当地住户，负责灌溉保护。

五、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、草皮、树根、草根，均禁止采掘，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。

六、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，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，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。

七、如该县长保护不力，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。^①

这一《保护办法》与1932年的《保护办法》相比，其内容和措施更加完善，不但规定了各县、区、保、甲保护左公柳的具体方法和责任，便于操作，而且明确规定了砍伐、破坏左公柳应受的严格处罚并要求各县“随时派员视查”。随后，各县对其境内现有左公柳进行了全面清查、编号并将统计数字上报省政府。

然而，《保护办法》并未得到各地官吏的有效贯彻和执行。左公柳遭砍事件仍在屡屡发生。1939年甘肃省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巡视陇东，途中“见官道两旁之左公柳被人砍伐甚多，并有剥去树皮者。树虽婆娑，生意尽矣”。而且多为“斤斧新痕，显系最近砍伐”。据此，限令各县在一月内，将该县境内道旁树木，不分大小一律点数、编号报省建设厅，并要求各县“责成当地头人、居民切实培护。如有枯萎，须将树木号数具报县府。县府据报后随即派人查验。如系因被人剥皮或砍伐而枯萎致死者，应将该地人、居民从重处罚，并务将毁坏之人查出重办”。“责成建设厅随时派员考查。嗣后，道旁树木不分大小、种类，如再发现砍伐或剥皮痕迹即将该管县长呈请从严处分”。重申对左

^① 王艾邦、陈乐道：《“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”——民国时保护“左公柳”史档解读》。

公柳严加保护。^①

1940年10月宁定(今广河)县民众密报省主席,称当地保长私自倒卖左公柳:“今年,县政府颁谕,令当地保长估价出卖,等情。不料宁定政治尚未入轨道,藉公营私、不顾公德之保长,将以三等价估卖,大者六元,次者五元,小者四元,还以公树送人情者亦有之。如此胆敢瞞上营私,百分之一估价公树,目无法纪。而文公百余年功绩,国家不得沾益,诚可痛哉。”为此,1941年2月28日,甘肃省府发布训令指出:“该县左公柳,既关古迹风景,又能调和气候,亟应保存。据呈前情,合行令仰该县长迅即查办具复,并转饬所属一体保护。”同年4月29日,国民党甘肃省执委会主任委员朱绍良致函甘肃省府:“近据报告,竟有一般军民对于西兰公路附近之左公柳及兴隆、崆峒各山之林木,不知爱护任意采伐。”要求省府属“饬属对于本省之左公柳及各山林木加意保护”。随后,省府通令泾川、平凉、固原、隆德、静宁、会宁、定西、榆中、皋兰、永登、古浪、武威、永昌、山丹、民乐、张掖、临泽、高台、酒泉、玉门、安西等21县,“仰遵照切实保护,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备查”。诚然,这些训令通令对于保护左公柳客观上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。

1946年,隆德县有人报称,该县建设科长陈树德等人以估价处理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为名,盗卖左公柳,使大量左公柳被砍伐。省府接报后当即令隆德县政府认真查办。经查,隆德县建设科科长陈树德、苗圃主任安涛、神林乡乡长薛昌荣、沙塘乡乡长薛达等人,在奉令处理已枯左公柳时趁机盗卖了四百余株。隆德县政府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处罚,并对境内现存左公柳重新进行了清查、编号。经清查隆德境内尚存左公柳3610株。本着“亡羊补牢,犹未为晚”之训,隆德县议会还专门拟具了《违法变卖左公柳处理办法》,其中第三条规定:“此次清查现存之左公柳,应由县政府负责重新编号、列册登记。除县府存案列交外,登记册抄发所在地之乡镇公所,负责切实保护。非呈奉省府核准,任何人不得砍伐,并将此次所伐空缺趁兹植树时期,补植新苗,保护成活,以重先贤遗爱,而免再有同样情事发

^① 慕寿祺:《甘宁青史略》卷31,第9页。

生。”^①

纵观民国时期，为了保护左公柳，使其免遭砍伐，地方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较好的办法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，部分有识之士也为之呼吁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对砍伐左公柳的行为起到了某种抑制作用。但从根本上看，由于当时政治黑暗，吏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社会环保意识薄弱，纵然有好的办法和措施，也只能流于形式，难如其愿。

三、左公柳的传说与诗话

左宗棠在甘肃时一心为民、造福地方，深得老百姓的爱戴。据载，他在离开西北时，“关内外闻之……胥惶然如失所覆，巷议户祝，筹所以留公，而不可得，则奔趋幅亿，顶香膝跃，呼感恩，数十百里无绝声。”^②在甘肃的一些地方，至今还流传着左宗棠栽树护柳的故事。

在酒泉就有“斩驴护柳”的传说。相传，左宗棠从新疆返回酒泉后，看到酒泉有些树木的树皮全被剥光，四大街的新栽树木多已死亡，他十分愤怒。一天，他微服出巡，发现乡民骑驴进城办事时，多将毛驴拴在树上。毛驴竟啃起了树皮，官吏、市民熟视无睹。左宗棠下令将驴斩杀，且通告城乡，从今以后“若再有驴毁林者，驴和驴主与此驴同罪，格杀勿论”。一时间，左公斩驴护树传为佳话。

时隔不久，酒泉又传着左宗棠斩侄护林的故事，说左宗棠的侄儿居功自傲，有恃无恐，对左宗棠植树护树的号令藐视，手执砍刀当众砍倒一片林木。左宗棠闻报，怒不可遏，以“毁林违纪”之罪，公开斩首示众。^③

这些传说姑且不论其是否真的发生过，但它的流传，说明酒泉人民知道了爱护林木的重要性，养成了植树护林的习惯，从此，酒泉城内林木葱茏，环境幽雅，造林护树之风代代相沿。

至于有关左公柳的诗歌、诗话，自从杨昌浚的那首“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的名篇传播

① 王艾邦、陈乐道：《“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”——民国时保护“左公柳”史档解读》。

② 秦翰才：《左文襄公逸事汇编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6年。

③ 上述两个传说均转引自李金香：《细说左公柳》，《档案》2000年第6期。

开来，不仅尚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读后“拈髯大乐”，也引发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的诗兴。吟咏左公柳成了西北边塞诗的新题材，“春风玉关”的诗话又创新格，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。我们孤陋寡闻，愿就多方搜求所得以飨读者。^①

清代诗人萧雄（字皋谟），湖南益阳人，著有《西疆杂述诗》四卷，对新疆地理风俗人事各项，叙述甚详。其中一首吟到左公柳，诗云：“千尺乔松万里山，连云攒簇乱峰间。应同笛里边亭柳，齐唱春风度玉关。”对新疆天山地区种植左公柳的情景，诗的自注中作了如此记载：“左文襄公檄飭湘楚诸军，各于驻处择低洼闲地，搜折树枝，排插为林。方及数年，已駸駸乎蔚然深秀，民甚德之。皆榆柳也。”

兰山书院山长、皋兰人吴可读写了《呈左爵相七律二首》，其二云：“感恩知己更何人？六十余年戴德身。千水见河山见华，维崧生甫岳生申。从来诗律推元老，自古边防借重臣。遥想玉门关外路，万家杨柳一时新。”

民国时期，无锡诗人侯鸿鉴著有《西北漫游记》，其中有他于1935年5月写的《自陕至甘有怀左文襄》七绝二首：其一：“自古西陲边患多，策勋自是壮山河。三千陇路万株柳，六十年来感想何？”其二：“杨柳丝丝绿到西，辟榛伟绩孰能齐。即今开发边陲道，起舞应闻午夜鸡。”诗中自注说：“出潼关至玉门关，左文襄植柳数万株于道旁。”

当代诗人吟诵左公柳的诗词更是不少。著名词人张伯驹在其《杨柳枝》中写道：“征西大将凯歌还，种树秦川连陇川。绿荫多于冢上草，春风一路到天山。”

有一首曾经在海峡两岸学生中间广为流传的爱国歌曲。词作者是民国期间的教育部长罗家伦。他当时要出使法国，途经新疆，考察了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民俗之后，写下这脍炙人口的诗篇，并由当时著名的音乐家赵元任作曲：“左公柳拂玉门晓，塞上春光好，天山融雪灌田畴，大漠飞沙旋落照。沙中水草堆，好似仙人岛。过瓜田，碧玉葱葱；望马群，白浪滔滔，想乘槎张骞，定远班超，汉唐先烈经营早。当年是匈奴右臂，将来便是欧亚孔道。经营趁早，经营趁早，莫让碧眼儿射西

^① 本节材料转引自秋帆、方学《“左公柳”诗话》，《档案》2003年第4期。

域盘雕。”

陇上著名诗人王沂暖《念奴娇·兰州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左柳生春，霍泉漱玉，功在人间世，严关迎送，几多贵主西去！而今岁月峥嵘，舆图换稿，景色添新丽。”

著名诗人袁第锐《恬园诗曲存稿》中有“天池”诗二首，其二云：“八骏西游未肯还，穆王消息滞天山。瑶池自有奇花草，何必春风度玉关。”萧涵加注曰：“春风与玉门关一案，可分三个阶段。王之涣：‘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’其第一阶段。清末杨昌浚之‘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’一反王之涣原意，是为第二阶段。先生此诗，先说八骏西游未肯还，暗示天山水草富饶，非无春风，八骏愿意‘安家落户’而‘未肯还’。次说当年穆王不返，正为瑶池值得终老，所以无消息者，只是音书远隔而‘滞’，并非其他。末两句点明正题，在‘春风玉关’这一场公案上可以说是‘另辟蹊径’，故为第三阶段。”^①这首诗虽非专咏左公柳，但为“春风玉关”另创一格，为此段公案增色不少，故专录于此以志存留。

诗人谢宠有数首诗词专咏左公柳。其中《杨柳枝》之一云：“王母蟠桃去不还，左公杨柳老阳关。请君莫羨前朝树，多育春苗绿北山。”《左公柳前》云：“老干依然出叶新，左公遗柳百回春。金城父老河边歇，犹说前朝种树人。”《南歌子·敦煌古道见左公柳》云：“挺干盘根固，抽枝出叶新。玉门关外障沙尘，仿佛龙城飞将抖精神。绿荫天山月，魂归瀚海春。风流早是百年身，犹自飘花吐絮逗行人。”

赵幼诚《左公柳》云：“闹市蓝天已久违，沙尘暴虐逞淫威。百年古柳谁曾见？隔纪重论是与非。”

武正国《左公柳》云：“疆土岂容沙漠吞，广栽苗木扎根深。”万千荫路双排柳，护送春风度玉门。

龙景和《左公柳》云：“杯酒阳关古畏途，筹边远略靖西隅。春风一碧三千里，合抱今能有几株！”

陈乐道《春柳》云：“左公遗爱问谁怜？望里春云罩碧烟。千种离

^① 袁第锐：《恬园诗曲存稿》，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9页。

思萦别渚，万条吟绪托吹棉。浓遮关塞停征马，翠拂楼台忆锦年。看取神州新画幅，河山染绿浩无边。”

关重尧《酒泉观左公柳》云：“万缕千条锁新秋，十里百陌觅绿洲。梦远江南三湘子，寒近北疆岂封侯。左公柳映祁连雪，金池水动征夫愁。柳色向人犹绮丽，酒泉绿事令绸缪。”^①

上述诗篇，或借史抒感，评论人物；或托物寄兴，关注生态，各具风格，从不同侧面展示出一幅幅左公柳的生动画卷，抒写出了左公柳的遗风流韵。

^① 引自《国土绿化》2001年第4期。